

封面设计 柴立平
责任编辑 铁 流

《故事新编》论析 张仲浦 王荣初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875 字数86,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统一书号：10317·8 定 价：0.32元

目 录

- 1 《故事新编》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 36 对创造者的讴歌
——《补天》论析
- 55 困境英雄的坚毅奋斗
——《奔月》论析
- 66 普通劳动者的光辉
——《理水》论析
- 78 避世者的悲剧
——《采薇》论析

90 复仇者的怒火

——《铸剑》论析

104 “大而无当”的思想家的归宿

——《出关》论析

122 颂“中国的脊梁”

——《非攻》论析

137 欺世者的狼狈

——《起死》论析

150 后记

《故事新编》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从第一篇《不周山》发表起，就有不同的看法。成仿吾同志早年曾经错误地在《〈呐喊〉的评论》里，说这篇是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不同于《呐喊》中其他各篇的“自然主义”。鲁迅先生认为这篇“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在《呐喊》再版时，便将这一篇删去。可是后来所谓油滑之处越来越多，又编成一本《故事新编》。这一个大家熟知的旧事，把它重提一下，有什么必要呢？我以为这里面包括创作上几个重要问题：第一，成仿吾同志认为写《不周山》是作者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廷，也就是说，作者的创作道路可能从此转变，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这是创作意图问题。第二，他认为这篇和《呐喊》里其他的自然主义作品不一样。这是创作方法问题。第三，鲁迅先生认为这篇作品穿插现代内容，有油滑的缺点。这是历史

小说创作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展开争论。前几年关于《故事新编》的讨论，又几乎集中在所谓“油滑”的问题上，讨论也没有全面开展。因此，我想就创作上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创作意图和艺术概括

鲁迅先生“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从现代到古代刻划人们的灵魂，发掘“中国的脊梁”。他的《呐喊》和《彷徨》，“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阿Q式的革命，爱姑式的反抗，闰土式的“辛苦麻木而生活”，魏连殳式的“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作者对这许多不幸的人们，寄予深厚的同情，提出严肃的批判，更重要的是解剖了社会的痼疾，指出造成他们不幸的症结所在。由于作者自己处在“病态社会”中，所接触的几乎都是病态的人们，因此，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也自然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典型。写《呐喊》时，为了达到这“疗救的注意”：“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②；但在写《彷徨》时，由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发出新的战友在哪里呢？”的“游勇”的感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彷徨》题辞正体现了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苦心和毅力。然而究竟受现实生活和作者世界观的限制，在作品中塑造不出积极的正面的艺术形象，从增强民族自信力的角度来鼓舞斗志，因为现实主义者不能“故意只看社会不看人（不涉及人，社会上又看什么），舍已有之典型而写可有的典型”^③。这中间，鲁迅先生把题材扩展到古代，1922年的冬天创作《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歌颂中国古代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力量。“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④从作者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写《故事新编》是“不愿意想到目前”，也就是说，现实太黑暗了，使战斗者很自然地从古代去发掘积极的正面的人物，增强民族自信力，来鼓舞“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是《故事新编》前期作品的创作意图。以后作者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自己在艰辛求索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很清楚地看到“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所以他说：“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⑤。

这是1933年3月说的话，联系到想写红军长征和想回到绍兴故乡写农民的创作意图，而又无法实现的情况，的确是“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非常确切地说明了“久没有做短篇小说”的原因。但也明确地认识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⑥这不是神话中的人物，而是历史中的人物，中国人民是勤劳而勇敢的。不再认为改造阿Q式的国民性是当务之急，因为“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这是造化生人的巧妙；而“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却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所补的造化之缺，是“古训所筑成的高墙”^⑦造成的。“他们象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⑧，而“阿Q精神”的形成和普遍存在，正是反动统治的“治绩”和长远的影响，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并不是这样。所以《故事新编》中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思想发展的标志，是“民族自信力”的光辉体现。而表现在后期的《非攻》和《理水》中的墨子和大禹的形象，寄意尤为深远。在现实题材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的苦闷心情下，能够从历史题材中，发掘“中国的脊梁”，来激发人民改造现实的昂扬斗志，这不但表现了这位伟大的革命作家的顽强的战斗意志，而且体现出他的光辉而又巧妙的战斗艺术。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故事新编》总的创作意图看来，作者写古人，尽量发扬神话、传说和史实中的人民性、战斗性及其他积极因素，写出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鲜明性格，来针对现实，鼓舞革命斗志，也就是说，“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在《补天》里，歌颂了女娲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在《奔月》里，歌颂了后羿在生活艰难中的艰苦奋斗、爱憎分明。在《铸剑》里，歌颂了眉间尺和宴之敖者的反抗暴力的韧性战斗。在《理水》里，歌颂了大禹献身人民事业的崇高品质。在《非攻》里，歌颂了墨子的反对战争、为民请命的正义行动和牺牲精神。这都是“中国的脊梁”。就是作品里着重批判的人物，也发掘了他们有些可以肯定的地方，如《采薇》里的叔齐，写出了他骨头很硬，“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他弄得毫无根据了”^⑨。这正是使统治者头痛的人物。在《出关》里对孔子，也肯定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⑩的精神。将古人复杂的性格生动描绘出来，创造艺术典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⑪。借古喻今，写古人正是为今人服务。这是作者创作意图之一。

但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并不满足于塑造出古人的典型，在艺术上的成就，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廷，而是重视战斗的社会效果。他认为做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

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所以并不“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而着重“为现在抗争”。这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且介亭杂文序言》里是说得很清楚的。《故事新编》和鲁迅先生其他作品一样，是在黑暗统治、言论不自由的那个《伊索寓言》的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前期三篇是“弄文罹文网”^⑫的年代，后期五篇是“怒向刀丛觅小诗”^⑬的年代，在反动统治者企图造成“无声的中国”的岁月里，采取神话传说及历史来做小说，正是为了在黑暗统治下便于进行革命斗争。取材历史与针对现实，并不矛盾，“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⑭《故事新编》便是运用历史小说的形式，针对现实，进行曲折隐蔽的革命斗争的革命文学。取材历史，容易钻过文网，出奇制胜。这是作者创作意图之二。

总的说来，作者的目的是借古讽今，写史实正是为了针对现实。那么，作者怎样进行形象思维，通过艺术概括来实现他的创作意图呢？这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作者作了谦虚的自白：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

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现在根据作者自己的话，举这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周山》（《补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不周山》（《补天》）中的女娲，是作为伟大的创造精神的体现者而出现的。她“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伟大的创造者是不自私的，她只是为自己创造了人类而陶醉在“长久的欢喜中”。作品一开头就生动地写出了她伟大的创造精神：

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况又头昏，两眼便蒙胧起来，两颊也渐渐的发了热，……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

女娲便是这样无私的创造者。但想不到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小东西嘴里的“我后我后”

——颛顼和共工，便是这世界的破坏者，他们掀起战争，搞得天崩地塌，和创造者的女娲，正是对立的人物。女娲面对着“天上一条大裂纹”，打定了“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日日夜夜不停的辛苦工作，等到再把天补好了的时候，她也“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她为补天而牺牲，是无私的创造者，也是忘我的劳动者，这正是“中国的脊梁”，是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力的英雄形象。作者创造这个人物，基本上是忠于神话传说的。而颛顼和共工的战争，又是作品不可忽视的思想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品写于1922年11月，这一年的4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国正陷在军阀混战的状态中。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写出“折天柱，绝地维”的残酷破坏，针对当时的军阀，作了严峻的谴责，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战斗意义。郭沫若在1920年写的《女神之再生》，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的中国——美的中国”^⑯。但郭沫若笔下的“女神”，是“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是寄托“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的革命理想的。而鲁迅先生却写出了女娲创造的、劳动的光辉形象，把被战争破坏的天艰苦地修补了起来。所以女娲的形象，又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当前

的客观现实“执着”的态度和韧战的精神。最后，女娲在辛苦的忘我劳动中牺牲了，作者通过“女娲氏之肠”的神话，作了一段极富现实意义的生动描写：

禁军终于杀到了，因为他们等候着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所以到得迟。他们……躲躲闪闪的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却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他们检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们却突然变了口风，说惟有他是女娲的嫡派，同时也就改换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写道“女娲氏之肠”。

针对那些具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吸尽人民膏脂却自称人民的“公仆”的统治者作了辛辣无比的讽刺。创造人类的女娲又被不肖子孙们打着她的招牌为非作歹，并取得“合法”的继承权来作“护身符”了。这又是作品抨击现实的另一思想意义。结尾写以前天地分崩的时候，女娲搁在巨鳌的脊梁上的那些山没有下落，秦始皇、汉武帝终于受了方士的骗，寻不到仙山，相继死掉了。给迷信者一声当头棒喝，便是作品讽刺现实的尾声。

这些都有“旧书上的根据”。作品为了加强针对现实的讽刺，穿插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揭露当时厚颜无耻的卫道者。同时在共工与颛顼

战争的场面中，以沉痛的心情，写出了人民的愚昧和麻木，在“炼石补天”的场面中，也批评了人民的吝啬和自私，体现了渴望人民觉醒的启蒙主义者的精神。这都是所谓“油滑之处”，和“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都是穿插进去的现代内容，却是作品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只有这样进行艺术概括，才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现实，也写出了女娲进行炼石补天的工作的艰苦，她的行动既不为人民所理解，厚颜无耻的伪君子又无理取闹，还是坚定不移的完成了这样伟大的对人类有益的工作，就突出了女娲坚毅的性格，塑造了鼓舞人心的伟大创造者的完整形象。远古传说中的“女娲”，通过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便突破了采取弗洛伊德说来解释创造缘起的思想局限，体现了更深广的思想内容，主旨是歌颂创造，反对战争。是写古人，又是针对现实的。由于作者对待古人的科学的态度和艺术的想象能够出色地结合起来，用典型化的方法，把现实的材料巧妙地组织到神话传说和史实中去，既写出了历史的精神，又讽刺了现实的黑暗，“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正如茅盾先生所说：“鲁迅先生这手法，曾引起了不少人的研究和学习。然而我们勉强能学到的也还只有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而他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的应憎和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的。”（《〈玄武门之

变>序》)《故事新编》正是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形成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出色地实现了作者借古讽今的创作意图。

创作方法的发展及其复杂性

鲁迅先生是大家公认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是就他的创作方法的主要倾向和特色而言。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因素。《故事新编》更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正如高尔基所说：“优秀的艺术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也写了一些和现实主义非常有距离的作品如《鲛皮》等小说”。⑩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从开始创作到编成，足足有十三年(1922—1935年)。由于作者思想的发展，世界观的变化，创作方法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从总的倾向来看，是由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具体分析起来，却不能以此概括他的全部作品。过去关于《故事新编》的论争，没有涉及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最近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精神、因素或色彩，却没有对作品作比较具体的分析。我想在这里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故事新编》前面三篇所根据的“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和“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虽是神话传说，却

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从朴素的唯物论观点来看自然现象，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意志。作者通过这些现实性很强的神话传说，表现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发掘“中国的脊梁”，“写着中国的灵魂”，借古讽今，通过描写这些英雄人物的不幸遭遇，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现实，激发人们改造世界的革命热情，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这里面，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女娲是人类的创造者，但她创造的人类——共工和颛顼却是世界的破坏者，结果女娲为补天而牺牲。后羿射封豕长蛇，为民除害，结果反弄得自己的生活艰难，英雄无用武之地。眉间尺和黑色人虽然表现了坚定不移的复仇意志，却也只好与强暴者同归于尽。作品的奇情壮采，虽然激动人心，闪耀着强烈的理想光辉，却看不出明确的历史发展的前景。从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看，一般看作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现实主义精神不等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二者虽有一致之处，也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补天》的主人公女娲，是一个非常动人的艺术形象。作者不采取神话传说中关于她形貌的叙述，而运用丰富的想象，塑造了这个造人补天的巨人应该有的样子。她绝世独立，“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

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作者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歌颂了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精神，美化了她的形象。她第一回创造了人，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了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作者想象世界中的女娲，便是这样无私的创造者，她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创造了人类，使他们生活在这样四季如春的“淡玫瑰的光海里”。但正是她创造的人类就把这样美丽的世界扰乱了，共工和颛顼一场翻天覆地的战争，屠杀了她所创造的人类，破坏了她所创造的幸福生活。这时，“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她面对着“天上一条大裂纹”，决定进行修补。“从此日日夜夜堆芦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她为了完成补天的工作，贡献了生命。作者把“抟土作人”和“炼石补天”两个故事巧妙地连接起来，中间穿插颛顼和共工的战争，一方面使女娲的性格为补天献身得到完成，歌颂先民创造精神的伟大；一方面揭露当时的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神州陆沉。《补天》这篇小说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女娲这个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意义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它帮助激起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实际地改造世界的态度。”这正是高尔基指出的神话的浪漫主义。作者塑造女娲这个人物，既不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的再现，更不是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塑造的典型，而是借助浪漫的想象，运用夸张的手法，倾注充沛的热情所创造的理想人物，是体现了我们祖先伟大创造精神

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现实主义写事物“本来有”的样子，浪漫主义写“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的祖先震惊于女娲创造力的伟大神奇，在他们的想象世界中，便是“人面蛇身”。诗人屈原在他的《天问》里曾提出问题：“女娲有体，孰制匠之？”鲁迅先生通过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歌颂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精神，加强中国人民的自信力，这样来进行综合创造，在作者的想象世界中，女娲是既美丽、又庄严，既品质崇高、又平易近人的顶天立地的巨人，她“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传说中补天的英雄人物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和那些“獐头鼠目”、“用铁片包了全身”的破坏和平的小东西，以及那个在两腿之间出现的古衣冠的小丈夫，正是对立的形象，激起了人们热烈的爱憎。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总是根源于现实的。

《奔月》的鲜明浪漫主义色彩，主要的不是由于写“和现实生活远离的故事”，而是在主人公后羿形象的创造上，表现了作者非常丰富的想象，不但对神话传说作了合理的取舍，而且虚构了突出主人公的复杂性格的艰苦环境。同时，又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细致具体地表现了后羿对嫦娥的真挚爱情，处处体贴入微，非常平易近人，使神话中的英雄